

时代精神缺失的个性化“修复”

——马莉散文：中国“50后”作家个案研究

董上德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州 510275)

摘要:在当代中国文坛,马莉是中国“50后”作家群体中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马莉散文自觉地以词语记忆为载体,借助单位观念的词语聚焦生命体验,精微地写出了个性化的生命体验方式,这是马莉对散文写作的新贡献。解读马莉,有助于理解“50后”在改革开放时代怎样走出精神缺失的阴影,如何填补自身的心灵空缺,以及自觉回归人性基本面的不懈努力。马莉以其个性化的视角去关注那些在特殊年代不能触及、不敢思考的问题,她借助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身边的亲人、观察周边的同事,去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面,去认识人性的细腻与美好;其散文回归世俗、回归了人性的常态,也回归了历史前行所依赖的理性动力。就某种意义而言,马莉散文是对一个特殊时代精神缺失的个性化“修复”。

关键词:马莉;精神生态;身体书写;日常叙事;散文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2-0100-07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2.014

一、引言

属于“50后”的马莉,其散文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异数”,甚至可以说,“马莉”就是一个值得解读的文本。解读马莉,关键词是“50后”。马莉本人,与众多的“50后”一起成长,在写作经历上却又与其他“50后”作家不大一样。当今活跃于文坛的“50后”作家,如贾平凹、张炜、止庵、赵丽宏等男性作家,王安忆、毕淑敏、韩小蕙、方方、张欣等女性作家,各有所长,各具特色。他们写乡村经验,写都市感觉,写书评书话,写艺术品鉴,写心理问题等,更多地是在省视自己所面对的大千世界与芸芸众生,而不像马莉那样以从容的姿态纯粹地阅读自己、阅读家庭、阅读“西方”。马莉的视野不像这些作家那么广阔,却也十分专注,她倾情于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他者的世界。

马莉的文章,不涉及“四书五经”,不引用儒家语录,甚至连诸子百家也不提;哪怕是《红楼梦》《聊斋志异》,哪怕是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在其文章里也找不到踪影。马莉写不出方方的《喜欢苏东坡》^[1],也不像王安忆那样为了写一篇题为《废都》

的文章而去查阅《青浦县志》^[2];不会像张欣那样以《老子》的一句名言来命名其散文集《上善若水》^[3],更不会像贾平凹那样在十多年里常常阅读《聊斋》^[4]。马莉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喜欢读中国古书,这是一位自觉不自觉地“逃离”了固有传统的散文作家。

“50后”的人们,本来就没读过多少古书。他们从小就读“社论”,读“梁效”和“初澜”,读各种政治小册子,读《孔丘其人》这类学术不是学术、政论不是政论的东西。长年接触的是大话、空话,以及滋生着虚伪的泛理学思维,时刻被灌输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政治口号,与古代理学盛行时代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一脉相承。在当时的政治词典里,没有“个人”,没有“私欲”,连“人性”也不能提。“50后”的人们,从小就难以阅读“西方”。没有多少翻译过来的著作,有的也只是像严复译述的文言文《天演论》等少量的书,或是《宇宙之谜》这类外国科普读物的中译本。至于在西方风行一时的萨特、加缪、普鲁斯特等,连影子都没有。甚至过去曾经出版过的《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世界名著中译本,也早已绝版,不再刊行。

收稿日期:2014-10-21

作者简介:董上德,男,广东顺德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马莉是“50后”里的一员。“50后”不得不经历的精神饥渴与精神伤痛她都经历过。马莉的散文,很不“传统”:不讲“桐城章法”,不学唐宋八家笔意,可又不得不承认其散文很独特,写得尖新而不纤巧,敏锐而不高调,细腻而不细碎,大俗却又大雅。自创一格的马莉,是当代中国散文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解读马莉,有助于理解“50后”在改革开放时代怎样走出精神缺失的阴影,如何填补自身的心灵空缺,以及自觉回归人性基本面的不懈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马莉散文是对一个特殊时代精神缺失的个性化修复。^①

二、“词语记忆”与个体生命成长史

在儒家文化的语境里,个体每每淹没于群体之中。由于长期忽视生命个体的独立性,而只强调群体性,中国散文史上的大量文章,往往是与个体生命的成长无关的箴、铭、序、记等。而与个体生命有关的传记、行状、碑文等,却是公式化的多,有个性描写的少,至于像《史记》那样血肉丰满的文章,能够与之比肩者,古往今来依然颇为少见。“个体生命成长”这一话题在散文领域严重缺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客观事实。胡适当年提倡写作自传,就是针对这一事实而力求有所纠偏。五四以来关于个体生命成长史的写作,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有重要突破的名著。这些散文著作以回想成分为主,为自己也为时代留下了珍贵的记忆,而且主要是“事件记忆”。

与事件记忆不同,马莉散文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写作空间,那就是“词语记忆”。马莉自觉地以词语记忆为载体、借助单位观念的词语聚焦生命体验,以此构成一个系列,精微地写出了个性化的生命体验方式。马莉的个体生命观察有其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与“50后”的特殊经历息息相关。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个体只具有工具性,是“齿轮”,是“螺丝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马莉的写作策略是:回归个体,以词语记忆的方式,展示具有挥之不去的时代印记的“个体生命成长史”。马莉系列作品里的个体生命不仅是有血有肉的,而且是备尝艰辛的;是被特定时代塑造过的个体,是体验着时代转换的个体,是能够感知世相巨变的个体,又是长于品味生命细节的个体。

这样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具备“时代标本”的价值。后人若要读懂中国1950至1970年代的历史,读懂1980年代以来的观念变迁,马莉的“词语记忆”系列散文可以提供令人细读的生命文本。马莉将其命名为“词语的个人历史”^[5]。她所选择的词语是日常性的,如“潮湿”“气息”“声音”“等待”“疼痛”“伤害”“想念”;又如“内敛”“本能”“品质”“良知”“欲望”“质朴”等。表面上看,这些词语的选择不成什么体系,马莉大概也不会刻意去借词语的组合来建构体系。可是,这些看似随意选取的词语,却在马莉生命史上留下很深的印记,是生命体验诸多环节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词语具有互文性,我们在解读时需要梳理其中的互文关系。

试以“潮湿”一词为例。每个人都有面对“潮湿”的经历,可是在马莉的成长史上,“潮湿”另有深刻意蕴,它深刻到与血统相关。马莉对血缘关系的体认既离不开特定年代的“血统论”,又力图超越一度政治化的“血统论”,且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语境里对血缘关系重新做了广义的理解。马莉写道:

中国上个世纪的60年代,是一个有问题的年代,仿佛人一生下来就带上了许多问题。在那样一个有问题的时代里,许多个人的行为都打上了问题的烙印,就像在一个耻辱的年代里,所有圣洁的事件都变得耻辱、变得不可告人。他们被人们批判,一次次地被组织叫到大庭广众面前被革命群众狠狠批判。他们不被人理解,他们每天低着头走过广大的人群。^{[6]229}

马莉的母亲就因为“阶级成分”问题而吃尽了苦头:“我母亲的所谓‘阶级成分’当年被划定为破落的‘地主’(我母亲为此吃尽了苦头!她认为是划重了,应当划为‘小土地出租’才合理)。”^{[6]242}“血统论”的阴影曾经笼罩着马莉的家庭。可是,马莉却以自己的血统为荣,她为自己的血统去政治化,她要从血缘关系出发去寻找自己写作的内在密码:

在我的生命史中,我的母系家族来自于南方,我的父系家族来自于北方,因此我的写作实际上被两股身体的力量牵引着,碰撞着,时而发出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声音,我的写作属于明亮的天空与潮湿的大地这两种记忆相互纠缠的写作,属于个人经验在体验与幻想中达到超验的写作,属于南方的写作,属于女性的写作。

她尤其重视自己的南方血缘,这种血缘观带有广义的色彩,甚至连南方的“潮湿”也已经转化为马莉的写作密码,故而,她在《潮湿》里写道:

我是一个生长在南方的女人,我已习惯了南方的

潮湿对我的身体日积月累的袭击,……我只知道,在南方这片潮湿阴暗炎热而阳光却无限灿烂的土地上,我的母系家族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种植历史,她们的种植都与大地的潮湿相关,与她们的生育、眼泪、爱情、怯懦和梦想相关。^{[6]83-84}

马莉所体验的个体生命史与她的写作进程高度吻合,就其写作密码而言,母亲、母系、南方、潮湿都是十分重要的元素,须臾不可分离;这些元素是广义血缘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南方,所有女人的生命都注入了芬芳馥郁的香气和巨大的潮湿气息,那些在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的俗常事务、语言、想象、季节、茂密的树叶以及一个花瓣上的迷雾的潮湿部分,几乎都延伸着南方忽隐忽现的时间和南方女人身体里最为迷人的现实。我喜欢在潮湿的天气里出门购物或者在家中写作,尤其在阴雨绵绵的天气里写作,我的心情会使我的面孔变得平静而安详,我的所有灵感会从我的脚下沿着我身体肌肤的每一个细小的毛孔、蓝色的毛细血管、绿色的神经,爬遍我的全身。

这是十分个人化且精微的生命体验,一个南方女人的生命体验,一个不刻意回避身体感受的女子的生命体验。正因为不回避身体感受,马莉写了一篇《身体》。身体,是生命存在的证据。对身体的认知,是体验生命的基本前提。曾几何时,我们缺失了生命教育,忽视了身体感受,于是在特殊的岁月里,“打、砸、抢”的大戏经常上演,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打击对象”实施身体虐待,“武斗”成为“50后”们无法摆脱的集体记忆。不少人的身体是那样轻易地在“武斗”中消逝。鉴于此,马莉重新审视身体:

身体是所有隐秘的事物中最为隐秘的事物,人类身体的历史长河在风景的幻想之中逐渐成长,形成了所有言说之中最难以言说的言说。如果你裸露着自己的身体,在一间卧室的落地镜前观看它,这就意味着你泄露了一个人身体的奥秘。这个人就是你。

在人类的所有书写中,如果不敢正视自己身体的历史,人类的所有书写是不可信和虚假的。

我醒来的第一件事情是让镜子照见我的身体,我披散着黑发穿着柔软睡裙的身体,从一面紧靠床边的梳妆镜子里观察我的面孔是否因为昨夜的梦境使故事情节还残留下了线索。更多的时候,我会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身体的其他细节。身体是我活着的事实,是谁也掩盖不了的事实。

她强调“身体是我活着的事实”,谁也没有随便剥夺他人活着的权力。马莉在文中还细致描述了

对自己、对他人身体的感知,肯定了身体的神圣与诗意。^{[6]60-70}让身体永远走出无端被虐待的阴影,重新揭示身体的世俗性与神圣感,为既世俗又神圣的身体歌唱,这是马莉的立场。我们可以在她另一篇散文里看到这样的表述:“我们都经历过一个血淋漓的黑暗时代,或者说我们曾经历的时代正是由于对身体的革命而导致了身体的遗忘,使得我们贫穷。而今天我们由于恢复了对身体的记忆而恢复了全体人类的劳动尊严,使得我们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6]219}借助互文关系,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马莉对身体的认知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生发的。

在马莉所选择的词语里,有一个特殊的词语不能不提:“神性”。对于马莉而言,“神性”具有类似宗教的意义但不是宗教本身。马莉所体验到的“神性”源自她与诗歌的第一次相遇:

回想起来,在个人的诗歌岁月里,我读到的第一首诗是莱蒙托夫的《帆》和普希金的《致大海》。那时父亲读大学的时候的俄语文学普及读物。我读的时候还不满8岁。虽然我无法理解诗歌的内在隐语,但我被诗歌中饱满、深沉而高贵的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所感动。“在大海深蓝色的浓雾里,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我喜欢这样的开头。我看见的是我所未知的或者无法想象的事物。我想,那肯定是神性。我至今一直热爱俄罗斯诗歌,从普希金开始,到后来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我想,在任何一个专制与暴君的时代,是诗歌的神性使人类的尊严不被强权所折服,是诗歌的神性使人类真正地站立起来。诗歌的神性让我们关注自身的每一个细小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感觉,进而关注人类共有的感觉。^{[5]128-129}

童年的经历尤其是受伤害的经历给马莉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会加快她的“关注自身的每一个细小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感觉”的意识形成。对于马莉“关注自身”“关注人类共有的感觉”诗学观念的形成史,我们可从《伤害》中窥见一斑。她忆述了9岁的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要命的“成长事件”。事件的起因是马莉读到一本没有封面的小说,里面写到一个男人解开了一个女人胸罩的细节。结果,有一次:

我来到一位女同学的家。我无意之中看见她家的阳台上晾着一件绣花小内衣,……便指着那件晾着的小内衣问同学的母亲:“那件是不是胸罩啊?”同学的母亲大惊失色地说:“你这么小,怎么问这个话?你是不是整天胡思乱想啊?”我站在阳台上顿时不知所措。这位母亲回到房间对她的女儿说:“你的同学的思想道德有问题,你不要受她的影响。”尽管这位母亲说得很小

声,但仍被我听见了,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伤害。我再也没有勇气面对这位女同学,没有勇气面对我的老师和校长,因为,仿佛一夜之间,全班的同学,全校的同学,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我的思想有问题,都回避我。9岁那年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我所受到的这场伤害和屈辱。我对我的母亲说,我要转学,我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

马莉在其成长经历中痛切地领悟到:“生命是易脆的,生命的尊严也是易脆的,伤害对生命和生命的尊严粗暴无礼”,“生命有权拒绝伤害”。^{[6]5-8}故而,马莉才会在《神性》里说:“我想,在任何一个专制与暴君的时代,是诗歌的神性使人类的尊严不被强权所折服,是诗歌的神性使人类真正地站立起来。”如果不了解马莉的“50后”经历,我们不容易理解她对“神性”的自定义,不容易理解她为何那么坚定地去体味生活里每一个带有诗意的细节,不容易理解她对自定义的“神性”的依归。

词语、语言都是人类认知自我、认知世界的工具。马莉笔下的词语看似普通,却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是对人性的精准把握。每个词语都是一个特定的叙事平台,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叙事平台上,马莉有故事要说,有感悟要倾诉。可是,这些词语很难排序,很难分出高下;它们胶着在一起,共同隐喻着一位女性诗人的成长史。相较于“事件记忆”,马莉的“词语记忆”挑战着散文在揭示人性的精微度上的极限,这是马莉在散文史上的突出贡献。

三、“简化空间”里生发的内心故事

日常观察转化为感悟,内心感悟反复验证着自己的生活历练,进而确认为足以帮助自己理解人生、理解世界的信念,这是马莉的思维方式,也是其散文境界得以延伸、深化的内在理路。

马莉在单位是编辑,在家里是主妇,其活动范围并不宽广。日复一日的编辑工作,年复一年的主妇生涯,是其大半辈子人生的基本状态,可以说,她生活在一个“简化空间”之中。这一点,她与铁凝、方方、王安忆等“50后”女性作家很不一样,后者或身兼行政重任,或身兼教学工作,活动空间比马莉要多得多、大得多。然而,马莉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点滴,并赋予点滴感受以诗性意蕴,开拓出散文写作的无限可能。她将日常存在及时转化为心灵体验,转化为似乎只有马莉才会在意的散文题材。这

样的转化,对于马莉而言,具有内心体验的个性化背景。她不刻意追求“故事”,而更多关注内心的动态“画面”。这些动态画面演绎着她的日常存在,而日常存在竟然还蕴含着不可思议的神性的东西。我们且看似乎除了她还不大有人愿意去写的“缝隙”。某次在医院候诊,她坐在一张木椅子上,发现椅子有条缝隙:

这条缝隙深刻地引诱我的视觉,仿佛要把我的目光延伸进缝隙里去。我想这样的缝隙肯定有可爱的小东西藏在里面,或者肯定有可爱的小东西要走进这缝隙里去。我十分兴奋地注视着这个缝隙,注视了很久,但并没有看见什么可爱的小东西出入其间,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刻,一群黑色的蚂蚁扛着一条正在挣扎的灰色壁虎大摇大摆地走来了,蚂蚁的队伍很长,它们兴高采烈地要把这条捕获而来的大于它们身体几千万倍的猎物储藏进它们的家居之中,也就是说,小小的蚂蚁们要把一只大大的壁虎塞进一条同样是小小的缝隙里去。

读者没有想到,马莉竟从一条椅子的缝隙里发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蚂蚁们……焦躁万分,却怎么也无法将偌大一只壁虎塞进那条缝隙里去。”马莉善于微观世界,善于将微观所得与宏观视域对比,意味深长地延伸着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此刻我极想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想把那只灰色的壁虎用一只小木棍夹住,使劲往那条缝里塞,这对于我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不行,因为这样一来,蚂蚁肯定以为世界爆发了战争,蚂蚁肯定会四分五裂地弃物而逃,如亡命之徒似地狂奔:蚂蚁肯定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这与人类的妻离子散、丧失家园的命运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缝隙也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隐喻,它已不再是空间概念,而成了可以生成情境的场所,这是马莉散文处理细小题材的特别思路:借助视觉中介作用将平常事物转化为视域中的动态场所,并从中发现剧情演进的过程:

我的目光集中在那条像女人的嘴唇一般美丽的缝隙上——当医生给我开好处方,当我把药取到手上,在这段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那条缝隙的周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蚂蚁们正在将那偌大的壁虎肢解着:头的部分已被一群蚂蚁抬进了缝隙中去,四肢的部分正在被另一些蚂蚁肢解着,眼看就要抬进缝隙里去了;而身体的部分正在被一群似乎是个头较大的蚂蚁肢解着……蚂蚁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它们对事物的否定态度显示了它们的基本原则,面对一个小小的缝隙,蚂蚁小心而又迅速地做着一件肢解这个偌大世界的工作。

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马莉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开拓出一片散文写作的新天地。可是,马莉并不满足于使用这种巧劲儿——马莉借助这一手段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散文境界。暂且返回上述“缝隙”的话题,马莉写道:

我无限喜爱那些有着缝隙的事物,这是一种不能忽略的细小而亲切的事物,在生活中我们无法否定它,是因为它时刻隐匿在我们的身体周围。我们的声音充满缝隙,因为我们的声音需要节奏;我们的情感充满缝隙,因为我们的幻想使我们心潮起伏,其实我们的身体也布满了缝隙——口、耳、鼻、眼等七窍就是我们身体的缝隙,人类通过这些缝隙与世界交换能力与信息……我相信所有柔韧的事物都是坚不可摧的事物,而坚不可摧的事物里面都隐藏着一个最朴素最核心的奥秘:缝隙。^{[6]136-139}

原来,一道小小的“缝隙”也可以成为通往哲学王国的秘密通道。马莉在处理“简化空间”里的感受时,并非将其停留在碎片化状态,而是融入了不无自传色彩的书写之中。马莉将家、办公室以及身边的一切都视作自己的文学场域,她甘心活在自己的场域之中,而不是活在他者的世界里。在他者的世界里,她并不回避曾经遭受过的白眼与伤害,这些都在其散文里有所描述;她更为珍惜自己的文学场域,因为在这里有所爱,在这里可以体验到自己的生存质感。

马莉有一篇散文开头就写到:“黑色的花瓶摆放在我的客厅的中间,我在花瓶里面插上了一大把银柳。”这只黑色的花瓶,在马莉的日常生活里充当着一个“角色”,它不仅是朋友情谊的见证者,还是开拓自己诗意感受的媒介。花瓶里插着银柳,随着时间的消逝,银柳进入了其不可逆的生命隧道:

呵,它们的枝体早已脆化,银色的花苞一个个像绒球一样轻轻地四散开来,落满一地,悲壮而惨烈。我大吃一惊,才明白其实银柳早已死亡,但它却依然故我地保持着最初的美丽——美丽地死去——至死也不改变它生前最后一瞬间的姿态和气质。^{[7]262-267}

花瓶、瓶中花物都是诗人,都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生命价值,它们是现实生活里诗人的老师。马莉在日常细节里有很多这样的老师,她的自传书写不能没有它们。

自然,马莉更离不开自己的家人。她的散文有不少篇目写家中人与事,它们在马莉生命历程里具有界碑意义。如《期待》,写对“期待”的感悟,尤其是写到1972年夏天期待患病的父亲“快些好转”,可

是“我的期待落空了”;“因为父亲的病,因为那一次期待,因为那一次寄予了无限期待的期待,我的期待再也无法弥补。哦,我的一生中究竟还会有多少次期待呢?我想,一个人有多少次爱就会有多少次期待吧?”^{[5]54-55}又如《倾诉》,写道一个很重要的家庭事件是年少的马莉偷窥三姨收藏的情书,从中知道什么叫做“倾诉”,尤其是情人的“倾诉”：“我打开了三姨的抽屉,我看见一封信又一封信,我在终于知道她读的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本比小说更好读的情书的时候,我的偷窥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那个夏天我一次次地来到三姨的卧房,一遍遍地读着那些充满烈焰般的爱情的倾诉,是的,是爱情的倾诉,那些倾诉像粒粒子弹一样射穿了我的心房,我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我读着,时而害羞脸红,时而兴奋不已,那都是一些十分迷人的句子,我早已忘记了,但我当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5]76}又如《等待》,其中更是写到一个女人生命中的“大事”：“在1986年10月9日,这一天是星期二,早上10时半,我经历了似乎是我的一生中到目前为止的最为漫长也最为惊讶的等待,那时痛苦和恐怖伴随着未知幸福的等待,……我十分沉重地躺在产床上,我等待着每一个新的片刻的到来。”^{[5]267}马莉是一位善于品读家庭的作家,家庭的一切几乎都可以进入其文学场域,日常家庭琐事在马莉笔下都会成为其心灵体验的道场。

在这样一种极为有限的时空关系里,马莉却开拓出散文写作的大千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家庭、办公室成就了一个普通又很不一般的马莉。其散文情境非常像传统戏剧里反复出现的“一桌二椅”,这是个相当简化的空间,上演着绵延不绝的内心故事。

四、马莉散文的文体特性及其逃离传统的问题

通读迄今马莉发表过的散文,发现马莉在散文里热情推崇很多外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提及读过他们的哪些著作,还郑重地引用了不少诗句、箴言和名著片段;可是,马莉没有说到她受过哪些中国古代作家的影响。

讨论这一问题,还是要回到属于马莉的“50后”成长语境。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红色经典”教育^②,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封资修”,这一代人没有机会读

“四书五经”,也不大有机会系统读唐诗宋词和“唐宋八大家”散文等。于是,“50后”在传统文化被人遗忘的历史语境里出生、长大,他们近乎天生地疏离了传统文化。尽管日后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可是,早年的疏离感在相当部分的人群里似乎并未彻底散去。至少,马莉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另一方面,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50后”却也零零碎碎地接触到一些外国作品,那往往是没有被焚毁的漏网之物。不要小看那些破破烂烂、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甚至无头无尾的“外国书”,它们给幼小的“50后”打开了一扇窗户,由此得知人类的情感可以那样表达。越是封闭,越是向往外面的世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旦打开国门,一旦国家调整文化策略,一旦重印世界名著的中译本,“50后”欣喜雀跃,争相阅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每每成为他们补充精神营养的一种途径。马莉正是在这一时代转折的背景下热爱上外国作品的。

自觉接受外国作品的洗礼,是马莉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她的散文自成一格,以精细度见长,合视觉、听觉、感觉与幻觉为一体,以感悟为文本的灵魂,这是马莉散文常见的文体特征。然而,除了马莉自身的文学感受产生的作用外,我们还应看到,其文体特征的形成与自觉接受外国作家影响密不可分。读其各种散文集子,可明显感受到马莉散文在表述方式上受到的外来影响。比如,我们在马莉《随想》一文里看到她与普鲁斯特的因缘:“我家的书柜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7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精装本和平装本。是的,这就是普鲁斯特的象征。这7卷本曾一本一本地在我的床头放过,我曾一本一本阅读过他。……这个下午,因为普鲁斯特,时光变得美妙而抒情。”^{[7]246-248}普鲁斯特,一位病人,一位生活区域极为狭小的作家,竟可以写出那样精细的、如长河一般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会给马莉重要的启示:品读身边的一切,也可以写出传世名著。马莉除了受到普鲁斯特的影响外,还可以看出受到佛吉尼亚·伍尔芙、博尔赫斯、J. H法布尔等的影响,她在散文里提到过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她心目中的文学英雄。

马莉的写作如此切近外国文体风格,似乎“逃离”了中国固有的散文传统,这给其散文写作带来怎样的利与弊?马莉散文突破了传统散文的某些格局,尤其是把女性细腻的心理写入散文,以及女性的隐秘体验、一些为男性所不易感知的生活角

落、一些在世人看来可能是“大俗”的话题,都在马莉的巧妙掌控之下,转化为细入毫芒的描写,加之俗而不失其雅的议论,而其诸多感悟更是中国散文传统里没有的东西。借助外国文学资源与精神资源,马莉从人性出发,反省自己的成长历程,检讨民族文化的缺失,探寻民族心态健康发展的途径。在精神层面,马莉虽然疏离于旧有的文化传统,却与五四以来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的新思想传统接轨,抒发个性,珍惜人性的光辉,回归人之常情,自觉接受中外优秀文化的熏陶,完善自己的心灵结构,更为敏锐地感知真、善、美。人性缺失的时代,马莉在痛彻历练后用散文宣示:人性的缺失是严重罪过,并且“现身说法”,在其文章里描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别具一格。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马莉散文不可能在固有的、充满着谀辞且不无公式化倾向的散文传统里产生。这也是马莉对虚伪文化的深刻反思与自觉背离。

不过,汉语写作离不开汉语的规定性、离不开汉语的简约之美与婉约之韵。有人说以写白话文的语感写文言文,或以写文言文的语感写白话文,是处理散文语言问题的一种可行做法。通观马莉的散文,由于与传统散文保持疏离状态,其文章的语言疏放有余而凝练不足,一些地方过于直白而显得韵味减弱,甚至会出现西化的语体。虽说选择何种语体是个人权利,可是,毕竟马莉的文章主要是让中国人读的,那么语体符合汉语的简约之美而不失奔放的表达,内含汉语的婉约之韵而又不失精细的描写,这或许是马莉在今后散文创作里可以留意或改进之处。

五、结语

“50后”的精神生态及其变迁轨迹,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是很特殊的一代人,其精神生态的构成,以及随着时代转折所发生的变化,极具某种历史意义。他们的精神饥渴与精神渴望在特定的时空里是并存的,这对于他们在改革开放时代里的人生选择有深远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有过明显的缺失,在可以弥补缺失的时代,他们在努力,在奋斗,在寻求自我的完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代人承上启下,他们曾经生活在历史的夹缝里,见证了人生的艰辛、政治的诡异与社会的前进。

而马莉的散文,以个性化的视角关注那些在某个特殊年代不能触及、不敢思考的问题,她有一种极为自觉的意识,借助观察自己的内心,观察身边的亲人,观察周边的同事,去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面,去认识人性的细腻与美好,去认知一切妨碍人性健康成长的人为因素。她还借助于阅读西方去疗救尚未失去记忆的精神饥渴,去拥抱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文学精品与思想成果,去填补成长历程中出现过的内心空缺。

马莉的散文消解了曾几何时无处不在的宏大叙事,消解了曾几何时挥之不去的空洞说教,消解了曾几何时滋生着虚伪言行的泛理学思维,它回归世俗,回归人性的常态,回归历史前行所依赖的理性动力。马莉在其不无艰涩的人生历程中做出了勇敢思考,体现出坚定的人文关怀立场,强调生命尊严,纠正了一度被扭曲的人性。尽管她不能够代表全体“50后”,可她却是“50后”千姿百态的思考和写作者当中的典型个案。她的精神生态构成,以及其散文里所体现的精神轨迹变迁,还有浸染于外来文化之后所产生的文体风格,都反映出时代变化而极具个人特色。

她的散文并非没有缺失,就语体和文体而言,还存在西化的痕迹,其文字还可以进一步回归母语的语感,简洁一些,凝练一点,文体还可血肉丰盈一点。而这些散文的得失所赖以产生的独特路径,只有结合“50后”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才能被完整地解读与理解。

注释:

- ① 学术界对马莉散文的研究已有王兆胜的《自足女性的自由言说——论马莉的散文创作》,见《河北学刊》,2000年第4期。李俏梅的《语言与思想的舞蹈——马莉散文论》,见马莉《夜间的事物》附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尚未从“50后”的精神生态及其变迁轨迹这一角度来论述;“特殊时代的精神缺失”,意指下文所论及的忽视生命个体、忽视人的正常欲望、忽视人的生命尊严等。
- ② 马莉在《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忽然看见》一文中提及“红色经典”:“(7岁后),我陆续读到父母当时收藏于家中的中外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毁灭》《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红岩》《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见马莉:《黑夜与呼吸》,鹭江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页。

参考文献:

- [1] 方方. 听取自然[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80.
- [2] 王安忆. 疲惫的都市人[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36.
- [3] 张欣. 上善若水[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 [4] 贾平凹. 平凹文墨[M]. 广州:新世界出版社,2011:102.
- [5] 马莉. 词语的个人历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6] 马莉. 黑夜与呼吸[M].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0.
- [7] 马莉. 怀念的立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夏莹

(Email:silvermania@qq.com)